

清代新疆关帝信仰研究*

门建军 郭院林

(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 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摘要]关羽形象在清代受到上至官方下到民间的普遍崇拜,关帝信仰盛极一时。本文通过考述清代新疆关帝庙的地区分布与关帝信仰的表现形式,分析了清代新疆关帝信仰盛行的社会基础,并探讨了移民屯垦因素对清代关帝信仰的重要影响,旨在考察屯垦移民对于新疆文化建设的作用。

[关键词]清代;新疆地区;关帝信仰

[中图分类号]B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1)012-0046-03

关帝信仰形成于南北朝至唐代,发展于宋代,盛行于明代,至清代达到顶峰,主要指“凝聚在关羽身上而为万世共仰的忠、义、信、智、仁、勇,其中蕴涵着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理想,渗透着儒学的春秋精义与释教、道教教义所趋同的人生价值观念,实质上就是彪炳日月、大气浩然的华夏魂”。关羽的忠使他一心不侍二主、忠于刘备;义使他不忘记旧情、义释曹操;信使他桃园结义、兄弟情深、肝胆相照、誓当同死。秉烛达旦夜观《春秋》,为他智慧的培养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行恶去善体现了他的仁达天下;匹马斩颜良、单刀会鲁肃则不啻为他骁勇、神武的见证。

关帝信仰在清代达到了顶峰,关羽形象的地位不断上升,信众所属的行业也日益多样化,关帝庙遍布全国各地。满族君臣在关外就开始了关帝崇拜,几次定都后又分别在皇宫外修建了关帝庙。“在他们定都盛京后,就在皇宫后门地戟门外为关羽建庙,并赐额联‘义高千古’。后入关定都北京后,仍在皇宫后门地安门外为之建庙。”入关前,世祖福临与蒙古族诸汗结拜兄弟,声言“亦如关羽之与刘备,服事唯谨也”。顺治帝入关后,于顺治元年(1644)封关羽为“大帝”,全名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顺治十二年(1655),又御制《重建忠义庙碑记》,进一步肯定关羽精神。康熙、雍正、嘉庆等也都在不断增加关羽的头衔,到道光时(1821~1850),关羽的头衔已加至“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关圣大帝”。光绪年间(1875~1908),关羽的封号陆续加成“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比之历代表彰尤著。清政府还不断提倡和鼓励各地政府和民间修建关帝庙,“清代较大的关帝庙皆由最高统治者皇帝御书题写匾额,清代关羽受到了极高的荣誉,其祭祀典礼甚至作为国家祭神祭天的重要典礼之一。

一、清代新疆关帝庙分布

清代在蒙古、新疆、西藏及东北地区等边境地区也修起了一座座关帝庙。在新疆这一多民族多宗教并存的地带,关帝信仰也兴盛起来。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新疆省县级以上地方所建关帝庙约27处,共计40多座。下文以清末由新疆通志局修纂的《新疆图志》为依据,考察清末新疆关帝庙分布情况,并分析其特点。

结合新疆各地关帝庙的情况统计可知,清代新疆关帝庙大多建于光绪年间;全疆关帝庙中北疆的数量为23座,南疆12座,北疆明显多于南疆;除南疆喀什噶尔道属和阗直隶州的关帝庙坐落于回城外,各地关帝庙均坐落于汉城;南北疆各道属中关帝庙所在的州、县在清代经济发展均相对迅速。清代新疆关帝信仰呈现出范围广、庙宇数量多、官修庙宇为主等几个特点。

首先,地域范围广。清代新疆关帝信仰在全国关帝信仰的影响下也呈现出范围广的趋势,南北疆镇迪道属、伊塔道属、阿克苏道属和喀什噶尔道属四个地区都建有有关帝庙。其中,镇迪道属12个州县都各有关帝庙,覆盖率为100%;伊塔道属5个州县中4个有关帝庙,覆盖率为80%;阿克苏道属11个州县中6个有关帝庙,覆盖率为54.5%;喀什噶尔道属12个州县中6个有关帝庙,覆盖率为50%。

其次,庙宇数量多。信仰范围的不断扩大,信仰群体的不断增加,对信仰活动场所的要求必然日趋增加,关帝庙数量的增多也成为必需。清代新疆四区庙宇总数共计35座,其中镇迪道属的关帝庙总数最多,而同为北疆地区的伊塔道属关帝庙平均数量则最高,为两个以上,部分州、县关帝庙的数量甚至多达三四座。

最后,以官修庙宇为主。从关帝庙的修建和修缮者来

* 本文系石河子大学高级人才科研启动项目“清代新疆屯垦与移民文化研究”(项目编号:RCSX200734)与新疆师范大学西域文史研究中心“《新疆图志》整理与研究”资助项目成果之一。

清代新疆关帝庙分布情况统计表

	州、县、厅	修建地点	修建时间	修 建 者
镇迪道属	迪化县	城东北隅	光绪九年(1883)	乌鲁木齐都统恭鏞
	昌吉县	城南关	道光十六年(1836)建, 光绪三年(1877)重建	伊犁将军金顺重修
	绥来县	城中街	光绪六年(1880)	知县李原琳建
	孚远县	城中十字大街	同治十二年(1873)	济木萨县丞李月桂提督孔才建
	阜康县	城西街	光绪十四年(1888)	知县王廷赞督绅民李玉成建
	奇台县	城中街	光绪二年(1876)	副将石辉田建
	吐鲁番直隶厅	城西南隅	光绪四年(1878)	同知奎斌建
	鄯善县	城东3里之东八棚	光绪六年(1880)	总兵宝恩曜、都司王星斗同建
	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	旧在城平庆会馆, 新城北关外西头	嘉庆六年(1801)创建, 光绪六年(1880)移建	刘鸿发移建
	哈密直隶厅	城西北郊3里	光绪十八年(1892)	副将萧元亨建
		城北170里天山	光绪三年(1877)	办事大臣明春建
	镇西直隶厅	城北门外里许	康熙五十九年(1721)及六十年(1722)四月	
伊塔道属	绥定县	绥定城北街	光绪十一年(1855)建, 十八年(1892)重建	将军金顺建, 总兵张俊重建
		绥定城东关	光绪二年(1876)	绅民那彦春、魏玉建
		惠远城北街	光绪十八年(1892)	知府潘效苏、知县以潢同建
	宁远县	城东门外南岔子	乾隆年间(1736~1795)	
		城西街	光绪二十六年(1900)建, 二十八年(1902)增修	知县汪步端建, 知县李方学增修
	精河直隶厅	城东郊	乾隆三十六年(1771)建, 光绪十一年(1885)重修	陕甘商民陈大明建, 商民重修
		城北门	乾隆四十八年(1783)建, 光绪二十三年(1897)重修	都司姜辅国建, 李克常重修
		城南关	嘉庆六年(1801)建	西商民建
		120里大河沿	光绪十八年(1892)	绅商建
	塔城直隶厅	汉城北街	光绪二十七年(1901)	同知雷铭
		满城北街	光绪十三年(1887)	三副将查春华建, 参赞大臣额尔庆额建
阿克苏道属	温宿府	城西门	光绪十三年(1887)	温宿直隶州知州陈铭钰
	拜城县	城西北隅	光绪十三年(1887)	知县杨廷珍
	库车直隶州	城中大街	光绪四年(1878)	候补道魏炳蔚提督张开俊
	乌什直隶厅	城东关北头	光绪五年(1879)	提督张曜
	焉耆府	泰将署西偏	光绪二十六年(1900)	泰将傅殿魁
	轮台县	县署西偏	光绪四年(1878)	补用知县王树圻总兵王文安建
喀什噶尔道属	疏勒府	城西街	光绪十年(1884)	知州蒋语建
			光绪二十八年(1902)	喀什噶尔兵备道朱冕荣提督谷振傑重修
	巴楚州	城东门	光绪四年(1878)	提督席大成
	莎车府	在城	光绪七年(1881)	提督董福祥重修
	和闐直隶州	四城	光绪四年(1878)	提督董福祥
	于阗县	县署东偏	光绪十一年(1885)	知县许茂光
	英吉沙尔直隶厅	城东北隅	光绪十一年(1885)	同知刘嘉德承修

看,除镇迪道属的库尔喀喇乌苏直隶厅和伊塔道属的精河直隶厅两处属于民间的商民或绅民修建外,关帝庙的主要修建者多为拥有都统、伊犁将军、知州、知县、提督等官衔者。其中,伊犁将军金顺和提督董福祥都分别在两个州、县各修建一座关帝庙。

二、清代新疆关帝信仰存在和盛行的原因

关帝信仰之所以形成并日渐广泛流布,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其内涵和精神符合普通大众的心理需求,另一方

面是为历代统治者认可并大力推崇。从北宋末年的“忠惠公”、“武安王”和“义勇武安王”,后经南宋的“壮缪义勇武安英齐王”,元代的“显灵壮缪义勇武安英齐王”,明代的“真君”、“协天大帝”和“三界伏魔大帝神”到清代的“忠义神武关圣大帝”、“忠义神武灵佑关圣大帝”,直到最后多达26字的封号“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武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在历代统治者的不断加封下,关羽的形象经历了由侯—王—帝—大帝—神的渐次攀升。

(一) 关帝信仰存在的社会基础

1. 移民来源地文化的移植渗透

在清政府的大力倡导下,清代移民规模逐渐扩大,包括来自陕西、甘肃、山西、直隶、山东、福建、云南、广东、广西、浙江、河南、安徽和四川等地的汉族和回族人口纷纷流入新

疆。大量移民进入新疆不仅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为新疆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也带来了当地的特色文化,丰富了新疆的文化内容。京戏、昆曲、越剧、豫剧等地方剧种的传入即可为例,花鼓戏受到了新疆民众以及入疆各省人口的普遍欢迎也是文化传播的结果。作为在内地民众中广为流传的关帝信仰同样如此,移民人口中陕西、山西和甘肃等商人对促进关帝信仰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在经商时身体力行体现出关羽身上所蕴涵的忠义、

诚信、仁勇等精神,还采取实际行动修建大量庙宇。

2.清政府的政策指向

清朝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叛乱的经验,使得清政府逐渐认识到了社会稳定的重要性。清政府在治理新疆时,对各民族的宗教信仰采取较为宽松的政策,既干涉正常的宗教活动,也允许各种宗教的并存,新疆成为一个多种宗教共同传播发展的地区。清政府允许蒙古和新疆北部的蒙古人、西藏的藏人在各地建立喇嘛庙,信奉喇嘛教、黄教。尊重南疆的维吾尔族人信奉伊斯兰教,允许他们诵经礼拜,保护他们崇拜的和卓坟。同时也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不仅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各种宗教力量的相互制衡,有利于清政府实现自己的统治,也有利于维护当时的社会稳定。

清代宗教政策的相对宽松和各种宗教力量的相互制衡,使得关帝信仰有了充足的存在空间;清政府对关羽的不断加封以及各地庙宇的广泛修建,又为关帝信仰的深入民间提供了客观必然。清代新疆的关帝信仰正是在这种社会基础上产生并不断得到发扬。

(二)关帝信仰盛行的主要原因

1.人口流动

清政府在新疆各个时期根据不同情况实行了相应的移民屯垦政策。“新疆屯田,始康熙之季察罕诺尔地驻兵。因于苏勒厄图、喀喇乌苏诸处创屯种,令土默特兵千,每旗一台吉,遣监视大臣一人。而哈密、巴里坤、都尔博勒及西吉木、布隆吉尔等,咸议立屯,命傅尔丹、梁世勋分职其事。吐鲁番亦驻屯兵。”这一为了抵御策妄阿拉布坦进犯的兵屯是新疆最早的屯垦史记载。之后,新疆各地相继举行了目的不同的屯垦。

清代新疆屯垦范围遍及东疆、南疆和北疆三大地区。参加屯田的人数众多,人口来源多样;屯田种类齐全,形式多样,有兵屯、旗屯、犯屯、民屯、回屯五种。清代新疆屯田的来源广泛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在乾隆年间(1736~1795),兵屯人口为陕甘地区占多数;旗屯人口多来自东北、热河、张家口、西安、梁州等地;犯屯来源尤为复杂,以直隶、山东、福建、云南、广东、广西、浙江、河南、安徽和四

川等省为多;民屯则多为陕甘地区贫困人口,也有部分商民和兵丁。

2.社会经济的变化

清代新疆的移民屯垦,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清代新疆统一后,在屯垦的大力推动下,农牧业稳步发展,工商业也有一定的进步和提高,一些城镇得以形成并日渐繁荣。其中,“天山北路的城镇主要有伊犁、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和塔尔巴哈台等,南路城镇主要有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阗、乌什和哈密等”。《新疆图志》中对关帝庙的记载也多集中在这些城市中,这是因为天山北路的城镇建于清代统一新疆后,分满城和汉城,居民大多为内地人口。天山南路的城镇也都有满城和汉城之分。这种满汉隔离的格局,为关帝信仰这一汉地信仰的植入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外部条件,是关帝信仰得以存活的前提。

在社会经济的变化中,尤其值得提及的是工商业的发展。清政府为了保障商旅的人身、财产安全,促进新疆贸易的顺利进展,曾采取平整道路、修建众多台站等措施。到新疆经商的商人中,有津商、湘商、晋商、陕商、豫商和鄂商等。各地不同行业的商人进入新疆,促成了商人集团的形成,而商人数量较多的地方又建立了行会,乾隆年间迪化城的山西会馆和乾州会馆就是以地域为中心组织起来的行会或同乡会。

内地各种商帮在新疆的不断发展,加上各类行会的出现,凝聚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的理念在商业中便日益凸显,如“晋商人生活俭朴,喜欢合作,企业大都是合伙经营”^①是为典范,而“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的田家祖训早在清代新疆就得到了完美体现。关羽则既符合仁、义、礼、智、信在商业中的诚信、忠义、团结、公平合理等丰富内涵,又满足了商人追逐利益的财神形象,还不时作为行业保护神出现,加上清代统治者的宣传和褒奖,关帝信仰就逐渐形成、发展,并最终走向兴盛。

[注 释]

皇甫中行:《文化关羽》,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157页。
卢晓衡:《关羽、关公和关圣》,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86页。

以上有关关羽头衔可参阅皇甫中行:《文化关羽》,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年版,第167页。

《新疆图志》共分29卷,内容涉及清代新疆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农业、交通、民族、考古及人物等几个方面,资料丰富详实,充分反映了清代新疆的社会情况。

《三州辑略·建置门》中对迪化城和孚远城等地关帝庙的统计中,有部分修建于乾隆年间的关帝庙,如乌鲁木齐迪化城北关五凉会馆的关帝庙建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山西会馆的关帝

庙建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巩宁城北门正大街的关帝庙建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等。详见和瑛:《三州辑略》卷2《建置门》,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78~82页。

赵尔巽:《清史稿·礼三》卷84,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541页。

赵尔巽:《清史稿·食货志一》卷120,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3508页。

王树楠:《新疆图志》卷43《民政四·户口一》,清辛亥活字本。

①蔡家艺:《清代新疆社会经济史纲》,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235页、第326页。

见和瑛:《三州辑略》卷2《建置门》,成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2页。